

明朝对外关系的和平特征

□ 谢剑南 杨彩霞

明朝在我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费正清和邓嗣禹为代表提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是“朝贡体系论”以来，其从西方角度由外往内看的观点似乎成为一种共识性认识，甚至成为一种研究古代中国天下秩序观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礼治体系的主流范式。然而，明朝作为朝贡体系模式中的典型朝代，不能完全以一种单向而僵化的认识论涵盖当时多元而复杂的外交实践。从当今角度来看，明朝对外关系实际上具有基于道义与秩序基础上的和平外交与合作共赢的明显特征，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

坚持和平原则

明朝建立后，积极恢复和调整因战争而受到影响的对外关系。在外交理念上，明朝十分注重发扬传统儒家文化与仁义思想，纠正了前朝元朝征战不断、威服天下的对外政策所带来的紧张外交关系；在外交实践上，奉行“以德睦邻和谐周边”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厚往薄来”的外贸政策和“一视同仁”的民族平等政策，积极构筑“相安于无事”并“永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共处外交关系；在制度化处理对外关系上，设立了完善的对外工作机构，设主客司“分掌诸藩朝贡接待赐之事”，设行人司“专捧节、奉使之事”，设市舶司“掌管朝会与宾客等仪礼之事”，同时，设有四夷馆为专门的翻译机构，还设有会同馆专门接待朝贡人员住宿的驿馆并成为开市贸易场所。

为了积极发展周边外交及对外关系，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外交措施。

一是积极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洪武四年九月（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颁布诏令，首次阐述了对外政策总纲领，强调“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这里既显示出朱元璋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决态度，提出军事应对或征讨的原则是“为患于中国者”，又明确提出对外政策总基调以和平外交为重，“不可辄自兴兵”。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刊布于世的《皇

明祖训》首章中，明确朝鲜、日本和大、小琉球国等15国为“不征”之国，形成了明朝独特的以“不征”为特征的基本国策与和平外交模式。

二是坚决消除西北北元侵扰之患。朱元璋提出，“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慎之耳”。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先后5次亲征北伐，重创北逃的北元势力，较好地解除了来自北方蒙元势力的侵扰，既让周边国家看到了明朝的强大，也让他们看到了蒙元的最后失势，使他们更坚定地放弃观望思想，进一步稳固了与明交好的态度。

三是大量派遣使节出访各国。明成祖朱棣时期，派遣郑和7次从海路出使西洋，派遣陈诚5次从陆路出使西域。他们沿途积极宣扬明朝和平友好与商贸互惠政策，积极与相关国家及地区建立和平稳固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关系。郑和出使西洋到达的城市和国家多达36个；1419年陈诚回国时，有20个中西亚国家、人数多达600余人的使团跟随回访。

四是采取了坚持正义、不倚强凌弱的外交做法。朱元璋曾说：“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惟欲中外人民咸乐其所”，“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在朝鲜由高丽王朝变更为李朝、安南王位更迭等过程中，明朝政府都于事后承认既成事实，并提出“推诚待之”“相安于彼此”，显示了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理念与做法。

致力促进和平稳定秩序

明朝建立初期，仍保持强大军力。据《明史》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正规军共有内外卫493个，每卫编制5600人，总兵力达276万人；明朝水师也很强大，明成祖时期的1420年达到鼎盛，共有3800艘船，包括1350艘巡船和1350艘战船。之后军队规模有所减少，但仍保持了适当规模，这为应对外来安全威胁提供了重要保障。

明朝一代，虽然采取了以“不征”为主基调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明朝始终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与区域秩序。元末明初，倭患已对沿海乡民生计财产和商贸往来产生了威胁。朱元

璋建立明朝后，十分关注倭患，洪武二年（1369年），他在诏谕“日本国王”（指日本征西将军怀良）时严正指出：“君臣非道，四扰邻邦。”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又两次以礼部名义给予日本文书，他诘问道：“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如彼日本边民，曾被中国人民为盗而扰之乎？”“今彼国逐年以来自夸强盛，纵民为盗，贼害邻邦，必欲较胜负见是非者欤？辨强弱者欤？”不过，朱元璋虽然不满日本做法，但仍然力排众议，“弗允”群臣征伐之议，并且晚年仍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

到了明朝后期嘉靖年间，倭患骤然加剧，发展为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勾结海盜肆意侵扰明朝东南沿海，严重威胁沿海地区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明朝统治稳定产生了很大威胁，到了非歼灭不可的地步。在朝廷支持下，在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的奋力打击下，很快荡平了倭患和海盜，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全与稳定。

16世纪初，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到达亚洲，先后侵占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很多地方。明朝水师与民众一起，奋起反击，在珠江口海战中击败葡萄牙殖民者，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妄图侵占澳门的企图；在澎湖之战和料罗湾海战中，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沉痛打击了西方殖民者的嚣张行径，维护了国家安全、区域安全和地缘秩序。1592—1598年，日本两次发动侵朝战争，中国应朝鲜求援两次出兵击败日本。这次战争，从长远角度看，实际上重新平衡了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维护了东北亚和平与安全秩序，促进了此后东亚300年间的和平秩序，奠定了后来东北亚的地缘格局。

积极发展经济和对 外商贸

明朝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分成两个马鞍形，两个顶峰分别是宋朝和明朝，明朝顶峰高过宋朝，两边滑坡处是元朝和清朝。明朝发展程度的确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例如，在农业方面，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达700万

顷，明末时达780多万顷；在瓷器方面，仅南京一地就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江西景德镇则成为世界瓷都；在矿冶方面，明朝铁产量在万历年间达9000多吨，而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

明朝发达的手工业和市场经济也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在南京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明朝也有着世界之最的第三产业，仅北京就有从业者近两万人。万历年间，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27年，他把在各地游历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服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他感叹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明朝时，中国人的足迹，东到日本、高丽，西到波斯湾、红海、非洲一带，北到蒙古大漠，南到南洋诸岛。明朝中外商贸合作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即使在西北，明朝也会放宽互市，如与蒙古俺答汗部关系缓和之后，接连开大同、延绥、宁夏等三处互市口岸，放宽了对鞑靼互市的要求。在当时对外贸易制度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明朝真诚欢迎各国前来贸易，以满足经济交流的实际需要，同时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私商贸易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易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不过由于倭患，明朝也曾阶段性采取过严厉禁海措施。总体来看，通过贸易和交流，明朝对外经贸合作形成了一种合作共赢关系，大明也成为当时世界最富有国家，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认为，在16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明朝也变得更为开放与繁荣。



秦军威名赫赫，众所皆知，而秦国还有一项“特产”，盛名可以与秦军相提并论，那就是秦国良医。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名医辈出，技近乎道，艺通乎神，留下不少故事和传说。

秦桓公时代的名医，名为缓，史称医缓，声名远播诸侯各国。公元前581年，晋景公病重，晋国派人到秦国求助。晋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出诊，而是关系国家外交的重大任务，秦王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医缓。医缓虽然医术高明，但是他并没有治好晋景公的病，甚至有可能根本没有开展治疗。因为医缓认为晋景公已经“病入膏肓”，用药“攻之不可，达之不及”。但是，晋景公对于医缓的直话直说没有生气，反而感叹他是神医，医缓的诊断与晋景公之前的梦境高度吻合。医缓离开之后，晋景公很快因为身体不适去世了。

秦国牢牢把握着医疗领域的制高点，名医技术精湛，成为一种重要国家资源。晋景公去世40年后，晋国君主晋平公病重，晋国再次向秦国求助，这次秦景公派出了医和。医和与他的前辈医缓有两点高度相似，一是医术高超，二是他的耿直程度比医缓有过之而无不及。医和给晋平公诊断后，直言不讳，认为他的病是贪恋女色引发的，并阐述了医学上著名的“六气”之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堂堂大国之君，被异邦之臣戳到痛处，晋平公表示不服气，他反问医和，人伦常事，女色不可亲近吗？医和不仅钻研医术，还把医学当成了一门哲学来研究，精通辩证之法。他不卑不亢，从容作答：“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真是千古之对。

医和不仅对晋平公的病情进行诊断，认为“疾不可为也”，还大胆预测，“疾如蛊，或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同时，医和认为晋平公如此放纵自己，而身为晋国执政大臣的赵武居然没有劝谏，其实已经失职了。医和的这些言论极大地触动了晋国君臣，也完全超出了一位单纯医生的职责。赵武（即赵文子）十分不悦，愤然道“医及国家乎”，质疑小小一个医生有多大能耐，居然敢妄议晋国国事。医和从容如故，说出震古烁今的医道精华：“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国医官也。”此时，这位秦国大医生简直是霸气侧漏。在医和面前，晋平公和赵武君臣俱服，认为这真是天下良医，“厚其礼而归之”。

医缓、医和给晋国君主看病，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秦晋之好到了秦桓公、秦景公时代渐渐烟消云散，两国力量在河西之地剧烈碰撞。秦国综合实力不如晋国，麻隧之战大败后陷入了将近两百年的低潮期，犹如万古长夜。秦国急需调动物一切因素，维护安定的外部环境，休养生息，秦国的大医生们登上了历史舞台。

虽然漫长的L型底部看不到尽头，但是秦国对于迎接反转的曙光从未丧失信心，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在如琢如磨中清晰起来。一方面，秦国和晋国虚与委蛇，消除其对秦国的警惕。晋国两次邀请秦国名医为国君看病，应该是秦国收缩战略获得成功的重要反映。忍字心头一把刀，但求换来一个相对平稳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新的同盟。晋国获得对秦优势之后，信心膨胀，转向与楚国争霸。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秦从康公时代开始，尝试与楚国接触，不断提升合作关系水平，最终在景公时代结成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同盟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大减轻了秦国南线的压力，可以专心谋取晋国以及后来的三晋。

秦国名医

□ 崔庆

古往今来，关键人物的健康状况，乃至起居微末之处都是重要情报信息。三国时期，诸葛亮和司马懿对峙五丈原，司马懿不放过每一个了解诸葛亮日常起居的机会。当他得知，诸葛亮夙兴夜寐，“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不禁感叹，“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并坚定了和蜀军打持久战的决心。秦国的大医生们给晋国国君看病，直接获取了最宝贵的情报信息，为秦国研判晋国走势提供了扎实的依据。因此，每次晋国求助，秦国国君都是亲自选派医生。医缓是秦桓公选择的，医和是秦景公选择的，他们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从晋景公开始，晋国公室和世卿大族之间的关系微妙，矛盾时而激化。在晋景公、晋悼公的强力整合之下，晋国维持住了国家平稳。这段时期，晋国国君的身体状态是国内各方以及诸侯各国关注的焦点。秦国名医每次为晋国国君服务，不仅深入了解晋国国君的状态，甚至对于晋国君臣关系也有了全面掌握。医和曾经预判，晋平公不会长久，寿命就剩三五年，“良臣将死，天命不祐”。这种信息的重要性对于秦国来说不言而喻。

秦国名医辈出，秦惠文王时代的医洵曾为惠文王“疗痔”，曾为齐宣王“割痼”，手到病除，想必齐王对此也是感激不已。秦国医生的作用还不仅如此，赢政的贴身医生夏无且在紧要关头甚至挽救了秦国。荆轲刺王杀驾，庙堂之上秦国群臣没有命令不敢上前营救。情急之中，夏无且抓起自己的药囊，精准地砸中荆轲。小小药囊成为“急救包”，为秦王赢得了宝贵的拔剑时间，最终有惊无险。

医生们的努力是一个小小缩影。秦胜六国，并有天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仅有虎狼之师。数百年间，秦国上下同心，内外同德，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信念不衰，志向不改，方成大业。



莫为“小人儒”

□ 赵 威

儒，起初是一种职业，是专门负责丧葬祭祀事务的神职人员，《说文解字》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先秦则有儒家学派；汉代之后，儒泛指读书人，包括广大“学而优则仕”的官员。

以人格论，儒也分“君子”和“小人”，《论语》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孔子曾告诫子夏说：“女（你）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但他未具体说明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想必聪明如子夏，听了老师的话，心中定然有数。倒是荀子对此做了解释，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嚙然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子夏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故作谦虚的“贱儒”，是“小人儒”的一类。后来，子夏在莒国做官，问政于孔子，孔子又一次告诫他：“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子夏之间的对话点到为止，显然，孔子是有所指的，说明子夏有急功近利的毛病；在另外一个场合，还告诫过子夏“过犹不及”。在孔子眼中，子夏身上的这些毛病便是典型的“小人儒”特征。

子夏可谓学问了得，能力非凡，有功干于打造、传承儒家六艺的基石。

太史公在为孔门弟子作传时，写子夏写得很高明，可“成一家之言”，他肯定了子夏的文学才能，但笔锋又转向道德一面，认为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并不能代表其人品。他引用了孔子的话，其中就有这句“女（你）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太史公用的是春秋笔法，看似没有做出自己的评价，实际上肯定了品德才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的观点。他借孔子的话，告诫读书人、为官者，处世要问心无愧，做人要坦坦荡荡，做官要清清白白，要为“君子儒”，莫为沽名钓誉、贪图功名富贵的“小人儒”。

整部《史记》，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记录形形色色的“小人儒”以警世人，公孙弘就是一例。公孙弘，西汉时菑川人，自幼家境贫寒，靠放猪养家糊口。到了40多岁，他才恍然有所悟，这辈子不能就跟猪打交道了吧？于是，立志读书，专治《春秋》。功夫不负有心人，加之天资聪颖，公孙弘逐渐学有所成，成为远近闻名的《春秋》学家。那时，还没发明科举，选拔官员是通过举孝廉的方法，公孙弘除了治学有方名声在外，还有一点使他饮誉乡里——特别孝顺后母。建元元年，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之士，菑川国便推举了公孙弘。他以耳顺之年西入函谷关，应征为博士，一大把年纪的公孙弘，自然倍加

珍惜这次机会。汉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他口若悬河，却不合武帝意思，被认为是庸才。公孙弘只好告病还家。

10年后，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良，公孙弘又背负众望入京。鉴于之前的教训，公孙弘这次“学乖”了，以揣摩上意为能事，皇帝的脸色就是他的行事准则，由此一跃成为皇帝的高级顾问。他在长安城遇到了大儒轅固生，同样应征为博士的轅固生此时已九十高龄，对人对事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力。轅固生从公孙弘的言谈举止中洞察了他的灵魂，并告诫他：“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意思是务必要按照儒家的正统学说事君进言，不要歪曲平生所学以迎合世俗。显然，正学以言便是“君子儒”所为，曲学阿世则是“小人儒”所为。

公孙弘却从轅固生的话里得到了另一番“醒悟”。有人在皇帝面前指责他做了大官，每顿却只吃一个荤菜，睡觉只盖一床旧棉被，是极冒险的沽名钓誉行为。他说自己确实有沽名钓誉之嫌，这个弹劾他的人很忠诚，要不然皇帝您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一顿饭言巧语说得龙颜大悦。事后他却对那个弹劾者设局构陷，欲除之而后快。朝堂议事，公孙弘尽讲些模棱两可的话，而每次进谏，都事先约好几位大臣一起，先让

